

在华国际移民杂糅性文化身份的建构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视角

卢毅¹,任振一²,陈朋¹

(1.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0; 2.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国际化移民社区的文化重建是现代移民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全球发展与地方发展的互构中,个体文化身份认同既无法摆脱全球化的影响,也无法离开地方性的重塑和民族性的在场,“文明交流互鉴”日益成为常态。全球化变量参与构建的多维度全球身份认同,超越了族裔和国家的文化边界。在异质性文化交流学习过程中,国际社区、移民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等对国际移民文化身份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社区作为一种文化缓冲物理空间,通过“混杂”“模拟”等机制形成了一种兼具杂合性和异质性的文化共同体,一种兼具世界性和地方性“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通过社区文化建设、移民社会网络互动以及社会组织服务等的影响,个体文化身份认同在文化杂糅空间中不断协商,其在反复“断裂”的边缘处又反复“建构”着自我。作为文化认同的世界公民,在族裔文化与国家文化,地方性文化与世界性文化间不断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动态建构。

关键词: 国际移民; 身份认同; 杂糅文化; 文明交流互鉴

中图分类号: C 922; K 9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19(2022)01-0066-06

一、引言

我国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现今我国也正践行着全球治理的职责,展望着“人类命运共同体”^[1]。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发表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为世界文明交流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方案^[2]。15世纪以来,人口迁移和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逐渐成为常态。人们在地理空间上频繁高速移动的同时,不同的文化传统亦在交汇时形成新的文化景观,越来越多的人和族群,或主动或被动的,置身于跨文化交流的浪潮之中^[3]。在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背景下,国际移民的发展与互动直接影响着全球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且在人类文明传播与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那些长期移民而言,他们长期地、高频次地生活在世界共同体之中,接

受世界共同体语言、文化的熏陶,最有可能形成对世界共同体社会、历史的认同。

在一定地域中,传统社区国际移民数量不断增加,社区内相应的组织制度、服务体系、环境设施等趋向国际标准,并包容了各类差异性的文化和生活方式^[4]。在我国,大中小城市社区“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人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这样的多元文化空间里使得处于其中的移民对自己本土文化、族裔文化产生质疑,而面对处于优势地位的文化,文化身份缺失及重新构建便不可避免。单一的、固定的族群文化身份认同,抑或二元民族-国家认同模型等无法解释移民出现的多领域、杂糅化与全球化的多重身份建构现象,并且这种多重身份对移民的类属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一位国家公民的个人行动可能对世界他国产生实际影响,一个国家的公

收稿日期: 2021-04-20

作者简介: 卢毅,男,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任振一,男,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陈朋,男,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民也应该因为这种可能的影响而重新规范自己的行为。然而,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存在过一种全球性的文明或者一种全球性的共同体^[5]。在 COVID-19 疫情时期,全球面临着公共危机的同时,狭隘的国家主义、保护主义、种族歧视以及国家间信任缺失等问题充分暴露,也使得暴力冲突、军事对立以及贸易摩擦日益频繁。本文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发,主要探究在我国城市中国际社区居民文化身份微观建构过程,分析国际化城市中社区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移民文化身份在本地居民、组织、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动态建构机制。

二、文献综述

同化论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争论始终贯穿于移民社会融入及公共管理研究之中。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种民族、多种文化的国家,在我国 56 个民族中就有 12 个民族有着独特的语言文字等。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新理念,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人民对待异质文明的态度。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无论在宏观文明交流上,还是微观上对国际移民个体文化认同、社会交流互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6]。文明交流互鉴具有深刻内涵,以历史互鉴、文明相通、平等尊重、人文合作四个方面为根基^[7],深刻阐明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时代趋向^[8]。

文明交流互鉴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文化以其交融性和累积性形成了现在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各种文化^[9]。当今世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制度相互交织的世界,各国及各族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个国家和民族在努力维护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也都在不断汲取着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文明成果^[10]。

文明交流互鉴根源于时代发展之需。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人类资源,甚至直言一旦去除了文化的差异出现一致的世界文化,虽然政治整合问题得到解决,但同时也可能会剥夺人类一切智慧和理想的源泉^[11]。谢清果、胡守勇等人通过对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研究,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方案”的深刻内涵,认为中国适时提出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模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12,13]。国际移民社区,不仅是静态反映社会关系,同时也在动态建构和生产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习俗。移民的大量迁入,多元文化使得原生态

的单一的文化地理空间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有的社区文化进程也被打断。

移民的全球流动使人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时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问题,国际移民在跨国迁移过程中始终会遇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14]。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看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不同国家、族群的接触更为频繁,族群之间的关系不仅影响到局部,甚至波及全球。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必然对移民的文化身份产生影响,传统的、本质的身份认同以及国家的或民族的身份又将迎来怎样的挑战,是本研究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现有对移民文化身份的研究都无法回避以下三个问题,即“我是谁”“我如何成为现在的我”以及“现在的我又是哪些文化建构的”。从有关身份认同的研究可以看出,对该词的定义主要有两种:其一持本质主义的身份观,与 Difference 相对^[15]。其二则认为在日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现代社会中不变的身份认同早已不再可能。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在差异中不断“协商”的过程,由此形成了第二种身份认同,即流动的、建构的差异性身份认同,依赖某种“他者”而建构起来的。个体不再只属于某个国家或民族,而是置身于世界体系之内。对于第二个问题理论家们认为不断与外界协商的过程,也是他们不断修订和重新定位自我身份的过程,并且身份的协商具有重复性,有时候需要连续地重复,不断地修订和重新定位,没有哪一次重复与前面一样^[16]。

在对移民文化身份的研究中,姜飞等人以广州非洲裔商人在华身份建构研究为个案,从“跨文化协商”的视角发现移民与本地居民、组织、媒体、政府之间客观性地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来华外国人移民身份认同和建构过程^[17]。而在同一个国家和历史背景下,文化剧烈转型期也会促使个体杂糅性文化身份的形成。蒋淑娴通过对沈从文先生生平与文化作品的研究,指出沈从文用“乡下人”的目光和批判尺度,打量自己跻身其间的都市生活。实际上,其并非原生态的“乡巴佬”,都市的文明力量又不时地触及“乡下人”的自卑情结。相似的研究还有对普希金杂糅性文化身份的研究。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语境中,普希金处于西方与本土、上层与下层的十字交会口,从而使他的文化身份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18]。对于这种“杂糅性”文化身份也有研究者提出批判和质疑,吉尔伯特认为杂糅性概念同样会遭受到二元对立的困境^[19,20]。批评者也指出民族主义身份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障碍,而杂糅性理论太过于强调心理和话语层面

的抵抗,或者可能只是当代跨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谋者^[21]。且身份的转换对于大多数移民来说不一定是文化丰富而是折磨^[22,23]。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全球文明互鉴日益成为现实,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身份作为全球性和本土性对立统一的矛盾综合体,直接影响着世界的、国家的、族群的以及地方文明发展,对移民文化身份的建构起着关键作用。但是,除了理论研究外,对“文明交流互鉴”和国际移民“杂糅性”文化身份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关注,在我国现有的实证性学术研究中依然罕见,仍有较大可为空间。

三、案例呈现

义乌位于浙江金华市,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是国家级的改革开放典型城市,也是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城市的外向度不断提高,并逐渐成为国际移民核心输入国。政府部门积极投入,在开放赋能,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5年制签证”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建设开放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成为全国营商环境评价试点唯一县级市。2019年实现全年出口额2868亿元,增长13.7%。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小商品工业贸易体系,获得全球小商品贸易市场的美誉。

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大量涌入义乌。截至2020年,义乌市人口已突破200万,其中本市人口74万,外来人口达到143.3万人,常驻外商1.3万,少数民族人口达到6万多人,在义乌这个城市里就有48个民族。国际移民在参与全球化市场过程中不仅为义乌经贸发展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同时也给“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创业者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与此同时也承担起跨国文化传播的重任。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背景下,义乌以福田、国贸、财富大厦、东方大厦和金茂等大型市场为核心的周边社区,长期聚居着大量国际移民,因此形成了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社区。

在义乌市,国际移民社区以江东街道J社区最为典型。该社区成立于2003年6月,位于市中心区域,行政区域面积有2平方公里,是义乌面积最大的社区之一,素有“联合国社区”的美誉。由于靠近义乌国际商贸城,加之社区内有两栋当时罕见的高层公寓,迎合了诸多外商的居住喜好,于是许多外籍客商逐渐在此集聚。截至2019年,社区有常住人口3512人,流动人口2.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2082人,包含29个

民族成分,以及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人员,是典型的多国籍、多文化的国际化社区。

作为义乌市居民结构最复杂的社区之一,江东街道J社区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国际移民数量较多,并带来其母国的各种文化。二是本地居民社会排斥与族裔的主动聚集,形成了国际移民特有的文化经济圈。三是社区历史较为悠久,长时间的交融与互动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文化空间。在社区内部,多方诉求交织,基层社会仍不断地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政府为了经济发展的目标,需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从社会治理层面来看,为了让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居民和谐共处,需要营造一个社区共同体。在以上基础上,J社区不断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并形成了特有的“以外调外”等居民矛盾调解和外商纠纷处理模式。

四、国际化社区文化景观与移民杂糅性文化身份重建

移民社区文化景观的重建是后移民时期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和杂糅性文化身份理论为研究国际化移民社区文化重建的图景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社区文化是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是一定区域之内特定的文化现象,涉及社区居民的价值观、行为习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等,具有地域性、认同性等特性。但移民的跨时空性、异质性完全打破了传统社区文化的历史性建构过程,使得社区文化的地域性、认同性 and 稳定发展路径受到挑战。与此同时,个体的文化身份也面临来自强势文化和他者的影响。因此,国际化移民社区的文化建设和移民文化身份重构成为现代移民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 社区文化景观的重建

在多种文化平等互鉴、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国际化社区通过“混杂”和“模拟”机制重建社区杂糅性文化。国际移民总是会用自己的意义系统对社区的原义做出修改、延异和重新建构。在国际移民社区,他们原先文化中的某些要素和特质因为失效而式微甚至消失,所以必须通过调适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实际上,这种调适体现为一种基于不同族群文化混杂共存空间关系下的族群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故而,江东街道J社区的文化景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呈现出独有的实践方式。

从政治参与层面看,J社区以党建为核心进行政治文化建构。面对众多的国际移民与多样化的需求,

社区党委牵头构建组织体系,成立党建联盟来实现组织共建与基层自治。在社区内部,由社区党委主导,J社区内多家单位及社会组织相互团结起来,组成党建联盟,实现资源共享。此外,在社区外部,社区党委通过公益创投、企业孵化等方式激发各类组织的参与积极性,有力地拓展了社区的活跃程度。以社区党委为核心的政治导向极大地提高了社区的社会参与,国际移民与本地居民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不断提升,“时间银行”制度也因此得以实践并传播。但是,既有的政治参与路径在国际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仍存在较大区隔,双方对政治的理解与社会参与的态度表现出显著不同的取向。国际移民对于社区的政治参与总体上依旧不高,对于第三方搭建的规则仍然保持警惕的态度。

从社会适应层面看,J社区以外商间互调的方式促进经济文化融通。作为外商集聚的区域,国际间贸易发展十分频繁,贸易摩擦和纠纷频发。但是,作为外国商人,对中国法律不熟悉会引起商事活动中的诸多不便,甚至会产生对中国商事制度的误解。针对既有的纠纷,诉诸法律并不是唯一的选择。面对现实,社区在既有经验基础上建立了“以外调外”的协商模式,借助外商之间相似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相对熟悉的社交关系,有效地解决国际移民之间、国际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商业纠纷。江东街道J社区设置了浙江首名外籍调解员,能说7国语言,推动化解社会矛盾。在此基础上,社区特地“聘请”少数民族和外籍人员代表担任社区惠民议事会成员,用来调解相应群体的矛盾,并代表各自的群体发声。义乌首创的“以外调外”模式在心理层面得到了外籍商人的支持,这也是其调解成功率较高的重要原因。然而,鉴于中外商事制度的差异,调解过程中涉及相关法律问题时,外籍调解员也往往需要依靠中国调解员,调解效率有时会受到影响^[24]。

从文化适应层面看,J社区以需求为导向进行社会文化重塑。文明交流互鉴是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多元文化的混杂阐释了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后形成的一种混合文化空间,其既具有多种文化的独特性,又有其共通性。社区关注本地居民和国际移民的文化融合问题,并不断向外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促进文化交流。面对语言文字的差异,社区借助优势资源,搭建汉语培训平台。面对文化的差异,社区于2014年建立了全国首个社区境外人员服务中心,为中外居民开展汉语、书法、电商、民俗文化等培训。除此之外,面对日常生活的社会压力,社区内营造了诸多社会公益项目,如四点钟学校托管班、亲子智慧

成长计划、独居老人关爱行动等。聚集于国际化社区的多元文化,在相互学习交融过程中,既保持着群体的相对独立性,又体现着文化的包容性。共同居住在一个地域空间的国际移民容易发生冲突、文化摩擦,并常常夹杂着歧视和偏见等,拉大了群体的社会距离,但在彼此之间相互碰撞和融合后,又开辟出具有多种文化特征但又独具特质的混合空间,也即产生出一种兼具异质性和杂合性的新的文化共同体^[25]。

迁移过程中产生的文化不适是移民融入迁入地社区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化社区移民的文化调适过程也更加艰难和复杂。在这种模式下的文化生产,开辟出“文化协商”的空间,恰好为生活在不同种族文化混杂空间关系下的身份认同与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交融场域中,不同文明的相互碰撞和交流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其间,国际移民与本地居民将会进行政治文化的建构、经济文化的影响和社会文化的重塑,从而使得该区域形成一个超越于移民和本地居民的文化杂糅空间。

2. 社区移民身份的重构

当两个或多个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和文化潜势的社群相遇时,不仅会产生两种文化的传播,带来一种共同身份,一种在文化杂糅中产生的新身份;也有可能产生文化冲突或“缺失”的文化焦虑状态。移民对社区文化和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不是简单的文化追根溯源,也不是简单的扬弃,而是移民社区多元文化差异性不断反复协商而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个兼具异质性和杂合性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即“间隙的”“之外的”、杂糅性文化空间的认同。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中,社区成员的身份认同必然会是多层次的复杂结构。

首先,文化身份出现动态转向。从城市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国际化社区在大部分中心城市已经陆续出现^[26]。对于现在的移民和全球的旅居者而言,本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已经不复存在,而由于跨文化交流使得文化“本源”、个人及所属集体身份的变化,使得通过以往共同信念来界定自我身份已然不可实现。在改变的过程中,简单的接受或拒斥都不能解决身份问题,人们在不断对文化进行“改写”,试图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化学反应中来界定自己,从而重构自己的身份。他们以“外国人”的身份进入一个差异性的文化之中,其种族身份、国籍等逐步淡化为统一的“外国人”。随着跨国流动范围的扩大,移民迁入的目的成为塑造其新的、更加普遍的身份的一个标准,如学生、商人,或游客等等。

“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不要觉得他们想法啥有

什么特别。来这做生意的都是想着怎么赚钱”(访谈资料: ZJ-CRJ-1909)

文化身份的动态转向经历了一系列调适过程。外来移民迁入新社区首先面临的是文化上的不适,原先掌握的生存技能出现功能衰退甚至丧失、社会交往关系逐渐断裂以及生活方式存在巨大差异等等使得移民的文化调适过程也更加艰难与复杂。在进入初期,对本国或文化相近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往密切,以期能够在新的社会中寻找必要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与当地主流文化进行不断协商的过程。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强化其固定的文化身份或以生理、语言、国家特征为依据的身份属性。

“跟我哥哥来到这里做生意,他们比我来的早……我们会经常到这里喝咖啡、聊天,在这有很多像我们一样在中国的人,做生意的……”(访谈资料: WG-BWJ-1909)

其次,文化身份认同逐步建立。移民离开母国后,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破裂,面临生存困境,致使其必须通过交友、婚姻、宗教、社团等方式重构社会网络。与移居美国“唐人街”华人通过血缘、地缘所组织的亲族网络和老乡会不尽相同,在义乌的外来移民主要通过商会和宗教社团两个途径发挥组织作用。商会和宗教社团作为提供社会支持的两个主要组织,缩短了国际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一方面,商会作为民间的自发性组织,既是联系政府的合法部门,也是经济互助的民间团体。商会多是按照国籍组成,如也门商会、尼日利亚商会等。

“我在浙大读书,硕士毕业后留在杭州教书,有十几年,在浙江××大学……之前都是在杭州,现在在义乌自己也做一些生意……他们让我做商会的会长,我们有一个群,负责给本国签证盖章……前几天我们的总统来了也是我负责接待的,有时候也会处理一些贸易的问题。”(访谈资料: BJST-CRJ-2009)

另一方面,社团以领袖为中心,以成员会议为运行机制,其功能是为成员提供各种帮助,如处理签证、经济援助等,并代表本国人与政府、其他组织交流,但是社团运作大都是非正式的,规模不稳定,其功能也不完善。商会领袖往往由长期居留在中国的本国人担任,其与中国政府以及本国政府都有着密切的往来,对本商会的成员拥有监督、管理的权力。商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移民在经济上的融入,商会帮助他们与中国商人通过“跨文化协商”建立了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样的双向、互动的过程,是一种文化上相互需求的过程和结果。

除此以外,相比社团,教会等宗教组织的行动更

加隐蔽,他们以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将移民置于宗教叙事中心,通过给来华经商赋予宗教意义,而为移民提供精神支持。这种教旨也对移民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宗教社团拉近了移民与中国宗教信仰者距离,同时关系网络中与本国人、社团、同宗教的教徒的联系比较紧密,而与中国本地人的交流仅限于贸易业务往来,总体上呈现出对内活跃、对外闭塞的社会圈,极易陷入一种相对孤立的境地。

最后,文化身份实现层次建构。国际移民个体社会网络对个体身份的建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类型可以将其社会关系结构具体化为三层,即核心层是移民商人圈,中间层为移民社团组织圈,外层则由移民商人与本地中国居民所组成^[27]。移民以“投资者、商人、学生及游客”等自我身份来到中国,随后对本地赋予的“移民、外国人”等身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过多元文化协商实现身份建构,达成“移民”与“商人”等多重身份的动态协调,并通过一些积极行为要求所在国对其合法身份的认可,在更深层面上为文化的融入创造条件和开辟通道。

移民文化身份的建构在融入过程中需要通过协商来实现。抵达中国初期,他们首先要经历的是关系网络的变化。在本国的社会关系,如家庭、朋友、同事等被疏远或断裂。这种疏离导致这个群体从既往社会中被边缘化出来,同时也凸显物质和情感方面支持的匮乏。由此,第一层社会关系网络由于强烈的生存需求快速建立起来。其次,不管同意与否,在本地人的眼中,身份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原来的“也门人”,变成了“阿拉伯人”;原来的“商人”“学生”等,被当作“国际移民”来看待;在自我认同和社会建构之间,横亘的就是“跨文化协商”的过程。与“政治公民”的遵纪守法、供赋纳税不同,“文化公民”也许另外有着情感的和承载认同的归属依附。文化公民开辟了一种本土世界主义的可能空间。文化公民的培育和发展,更能为移民提供良好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五、小结与展望

中国经济崛起、政治稳定和综合实力的提升,为世界范围内货币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人力资本的再生产提供了天然条件。因此,世界人口流动在中国的布局呈现出一个新动向,即我国正在从一个移民输出国转变为世界主要移民目标国。面对此种形势,无论从世界历史、国际现实,还是从中国发展来看,我们都需要积极理解并应对来华外国人引发的跨文化冲突问题。而“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

民对待异质文明态度的同时,也明确了我国国际化社区的文化发展前景,对国际移民个体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通过对义乌市江东街道J社区文化建设和文化身份建构的研究,发现文明交流互鉴在国际社区居民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多种异质性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学习中,移民社区文化图景呈现出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杂糅空间”,移民社区经过混杂与融合,最终会形成一个兼具异质性和杂合性的文化共同体。国际移民移居到新的国家必然会促使其所处的社会网络发生转变,影响其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即对“我是谁”的理解。物理和语言隔离区是一种文化保护区,发挥着跨文化传播缓冲带的作用。在这个区域里,移民与原住民、新来移民与以往已经扎根的移民进行对话和协商,从而在特定空间内涵蕴积极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模式。文化杂糅空间的形成能够促进国际移民积极有效地融入本地社会。

义乌的国际移民的商人属性较为突出,逐利性使得其文化情感遭遇困境,短期内难以建立移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若想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城市,“世界公民”的文化身份认同是最重要的一步。基于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建构和解释“世界公民”的内涵、如何促进移民扮演有责任的社区公民角色、世界主义形式的爱国主义是否可能等等。

注 释:

- ① 中国义乌网《义乌市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成绩单和2020年任务书》。https://news.zgyw.com/system/2020/02/24/010181190_sht-ml。
- ② 义乌市人民政府:城市介绍。http://www.yw.gov.cn/art/2020/9/21/art_1229136091_58303059.html。
- ③ 中国民族网《和谐社区,共有家园——记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http://www.56china.com.cn/showcase2892.html>。
- ④ 居民通过参加社区活动项目的志愿服务可以兑换相应的时间积分,如果自己需要其他的社会服务,可用自己的积分购买相应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 [1] 薛雷.“一带一路”倡议下培养区域性世界公民的意义与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2019(11):77-80.
- [2] 习近平.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15):6-8.
- [3] 查日新. 空间转向、文化协商与身份重构——霍米·巴巴后殖民

- 文化批评思想述评[J]. 国外理论动态,2011(3):74-80.
- [4] 戴春. 社会融入——上海国际化社区建构[D]. 上海: 同济大学,2005:181-185.
- [5] 赵汀阳.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1-114.
- [6] 许涛.“文明交流互鉴”对中外民间交往实践的指导意义——基于义乌民众与外籍商人社会交往的调查与思考[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0):170-178.
- [7] 马立志. 深入把握“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四点内涵[J]. 理论探索,2021(4):46-52.
- [8] 王宗礼. 论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41-47.
- [9] 何星亮. 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J]. 人民论坛,2019(21):6-10.
- [10] 张雷. 习近平关于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战略思想[J]. 理论界,2014(8):30-33.
- [11] 罗杰·M·基辛. 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53-57.
- [12] 谢清果. 文明共生论: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思想体系[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72-83.
- [13] 胡守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维解读[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6):30-36.
- [14] 韩震. 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06-113.
- [15] Michael Agnes. 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27.
- [16] Rina Benmayor. *Migration and Identity* [M].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5:74-82.
- [17] 姜飞,孙彦然.“跨文化协商”:广州非洲裔移民身份建构研究[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15-130.
- [18] 张存霞. 普希金多元文化身份探微[J]. 宁夏社会科学,2010(1):140-143.
- [19] Bart Moore-Gilbert.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 Practices, Politics* [M]. London&New York: Verso,1997:131-132.
- [20] Leopold Seder Senghor. *Humanis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M].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27-35.
- [21] 罗钢,刘象愚.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6.
- [22] 赵迎军. 从身份漂移到市民定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18(4):93-97.
- [23] RESNICK J. Alternative Identities in Multicultural Schools in Israel: Emancipator Identity, Mixed 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J]. *Oxford: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2006,27(5):585-601.
- [24] 吴卡,张洛萌. 涉外商事纠纷调解新模式探寻——以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例[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62-70.
- [25] 戴庆中. 混杂与融合: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重建图景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2013(12):138-143.
- [26] FREIDMA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M]. Hague: Development and Change,1986:69-83.
- [27] 许涛. 广州地区非洲人社会支持的弱化、断裂与重构[J]. 南方人口,2009(4):34-44.

[责任编辑: 都春屏]